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4-0027-04

# 张伯行理学思想探析

李晓虹

(郑州大学 哲学系,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张伯行是清初中原地区重要的理学人士,一生为官清廉,忠孝仁爱,以弘扬程朱理学、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主张穷理,重视《小学》,并把自己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信仰贯彻于人伦日用之间,以指导自己的人生,对中原地区的士人教育和程朱理学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道统精神的继承及其清正廉洁、忠事爱民的精神至今仍受人称誉和敬仰。

**[关键词]**张伯行;程朱理学;道统

**[中图分类号]**B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4.004

张伯行(1651—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号敬庵,仪封(今河南兰考)通安乡崇儒里人,人称“仪封先生”。清康熙24年(1685年)进士,考授内閣中书,改中书科中书。历任山东济宁道、河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等,后被任为南书房行走,户部右侍郎兼管国家钱币、仓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是清初在朝的重要理学人士,以兴利除弊为己任,为官清廉,忧国忧民,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据《清史稿》记载,张伯行中进士回家后在南郊构建精舍,“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看到《小学》《近思录》以及二程、朱熹的语录之后,说“入圣门庭在是矣”,于是“尽发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张伯行一生以弘扬“正学”——程朱理学为己任,曾在山东建清源书院、夏镇书院,任江苏巡抚时建紫阳书院,在福建任福建巡抚期间建造鳌峰书院,设立学舍,收集濂洛关闽等学派的代表著作63种,又增续集5种,刊印《正谊堂丛书》,从理学传承的角度出发,对不同学派的典籍进行整理,对当地的士人教育和程朱理学传播有极大的贡献。

在贪贿舞弊、追名逐利之风渐盛的官场,在声色犬马等物欲面前,张伯行为什么能洁身自好,坚守廉

洁作风、以民为本,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在义理与物欲的较量中,又何以能够坚守为官“誓不取民一钱”的原则?作为明清之际中原地区重要的理学人士,张伯行如何把自己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信仰贯彻在自己的人伦日用之间并用以指导自己的人生?学界对这些问题均未涉及。本文拟从张伯行清正廉洁、忠孝仁爱的日常行为,弘扬理学、提倡道统的儒学自觉,主敬穷理、提倡《小学》的修行功夫等方面对张伯行的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以管窥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从政理念的影响。

## 一、清正廉洁,忠孝仁爱

张伯行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廉官员。康熙中叶,贪污贿赂、徇私舞弊之风气日渐盛行,在这种氛围之中,张伯行洁身自好,坚持“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的原则,认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分,身即受一分之污”;“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sup>[1]</sup>张伯行仁民爱民,废除摊派陋习,并于荒年派人到江浙地带买米,设置义仓,救活大量饥民,深受百姓爱戴。在

[收稿日期] 2013-05-01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2CZX014)

[作者简介] 李晓虹(1975—),女,河南省息县人,郑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康熙五十年秋的辛卯科场舞弊案件中,张伯行因弹劾受贿官员噤礼而被免职。为此,苏州百姓罢市,扬州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野。张伯行离去时,士民扶老携幼送行并献上果蔬,哭着说:“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

张伯行为什么会坚守廉洁作风、以民为本,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呢?这既与其父张岩注重德性教育理念有关,也是张伯行对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具体实践。

孔子为后人塑造了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博施济众、心怀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伦理精神,继承孔子思想的思孟学派则进一步提出“尽心知性知天”、“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宋明理学则明确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人放置在天地之间、宇宙之中进行思考,拓宽了理论视野,为现世的道德生活奠定了形而上的价值依据。正是儒家的这种精神境界引领了张伯行,使张伯行摒弃佛道而归儒,选择以儒家圣贤而不是佛道二教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以做一个真正的与天地并居为三才之一、可以流传后世之人自期。张伯行认为既然生为今世之人,自然应修今世之事,而“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皆此生不可不为者也”,只有儒家博施济众、心怀天下的圣贤才能担当此责任和道义,佛道二教只修己身的处世态度纯属自私行为。

据《碑传集》卷十七记载,张伯行曾说,“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并且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万善之理统于一仁”<sup>[2](P20)</sup>，“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应该做到“不欺”,“天下惟不欺最难”,具体即是要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只有如此才能算是“不欺”。<sup>[2](P47)</sup>《困学录集粹》序文中评价张伯行说其“躬行实践之功为不可及也,立必以忠信不欺为主本”、“孝于亲者必能忠于君,廉于己者必能忠乎民。道理固不可易”<sup>[2](P5,13)</sup>。正是这种道德自觉和人生理念使张伯行在道义和物欲的考量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把“万分廉介不过小节,半点贪污便成大恶”作为居官律己的戒条<sup>[2](P66)</sup>,并坚守为官“誓不取民一钱”的原则。

## 二、提倡理学,弘扬道统

针对理学所讲的太极、理、气、性、命问题,张伯

行在继承程朱观点的同时,又做了自己的发挥,认为“太极”即是“天理”,君子“修之吉”,即所谓“存天理”;而小人“悖之凶”,即“违天理”。<sup>[2](P28)</sup>君子遵循天理而为,因此仰不愧而俯不怍,举止自如而常安泰自然;小人则徇人欲之私,势必趋利而为,从而为“气”所局限而常骄横。因此,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为世人确定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从而使人恢复天理之本善,去除人欲之私,并说“天以气生人,即命人以理,理不在气之外,人人得气以成形,得理以成性,性亦在气之中”。从“天”命人以理、人得气成形、得理成性的角度来说,这与程朱观点一致;但是张伯行认为“理”不在气之外而独立存在,“性”也不是与“气”二分,“理”与“性”都在“气”之中,这又与程朱不同。

张伯行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有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致知,为善去恶是力行”<sup>[2](P44)</sup>。这就更突出了其重视躬行实践的思想特点。

蔡世远在《困学录集粹》序言中说:张学“以立志为始,复性为归,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为准的,拳拳然服膺不懈,深悯世俗之沾没于势利,或溺于辞章,其高明者又为姚江顿悟之学所误,大声疾呼,如救焚拯溺”<sup>[2](P4)</sup>。可见张伯行提倡理学主要是因为当时之人为学目的或是为了名利权势,或是为了辞章训诂,或者空谈顿悟,流于禅学,因此,其生平以“程朱思想”自勉或勉人,并且“拳拳然服膺不懈”,对程朱所讲“天理”及格致工夫笃守实践,认为“格物、穷理、存敬”是为学实工夫,而自古以来善于学习者“无如朱夫子”,“恪守程朱是入圣贤的大道,泛滥诸家便错走了路”。<sup>[2](P21,23)</sup>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张伯行重视儒家的道统思想,并按照自己的意向对道统做了系统地分析和诠释。

“道统”一词首先见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道统思想的来源却是《孟子》。孟子在《公孙丑下》中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中必定会有留名于世的人。孟子在讲具体的传承时指出由尧、舜到成汤,再到文王与孔子,自己是继孔子之后承继道统之人。唐代韩愈正式提出“道统”,认为“道统”在孟子以后便失传了。张伯行大力宣传道统观念<sup>[3](P661)</sup>,并著《道统录》进行具体发挥。他通过《道统录》、《道南

源委》(6卷)、《伊洛渊源续录》(20卷)等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道统系谱,被称为清初“传道四先生”之一。在《道统录》中,张伯行把道统的源头追溯到伏羲,其所说道统系谱主要包括伏羲、神农、黄帝、汤尧、虞舜、夏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杨时、罗豫章等。从张伯行的道统系谱可以看出,他推尊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排斥荀子、董仲舒与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思想,认为只有程朱得到孔孟真传,因此为学之人应该对此笃守而不失;而陆九渊和王阳明提倡的默坐澄心方法虽可以“证道”,但其所讲“心即理”、“六经皆我注脚”以及王阳明所说“致良知”等观点却不是圣贤的“正学”,是以学术来扰乱天下。因此,不能“惑于其说”,应该有自己的立言宗旨。张伯行还指出当时“圣学”不明的具体原因,一是陆王心学空疏,特别是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易于流于禅学;而以颜元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又扰乱天下正道,无异于杀人。张伯行认为只有理学中的濂洛关闽四派、特别是程朱思想才是正学。他的《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三书对程朱一脉有比较完备的记述,以廓清异学为己任,反对李贽、颜元的言论以及佛道之学,认为李贽的书“一字一句皆可杀人”,颜元的言论与李贽的书一样“亦可杀人”;而“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殉名,皆刊也”(《国朝学案小识》卷二《张孝先先生》)。可见,张伯行的道统观是清初较为纯正的儒家道统观。<sup>[4]</sup>

### 三、主敬穷理,重视《小学》

张伯行认为,“天理”二字是“定盘针”,虽然人的世运有升有降,遭遇有常有变,但“天理”二字却是“移易不得”的,因此为学之人应该循天理而行。在张伯行看来,“道”、“天理”在天地之间是永不停息、生生不已的,“道”流行于天地之间犹如日月经天而行,犹如江河附地而流,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因此志于“道”之人的“体道”工夫也应该是“无时或息”、“精进不已的,不应该“以货利损行”、“以嗜欲忘生”、“以骄奢败德”,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自己“求进于向上一路”。<sup>[2](P21-22)</sup>张伯行为学宗旨是“主敬”以确立其根本,认为“万善之理,统于一仁,千圣之学,括于一敬”<sup>[2](P20)</sup>,并因此改其号为“敬庵”。在主敬的同时,与朱熹一样,他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内省以践其实,并提出“存天理,遏人

欲,是学者最切要工夫”,因此要时时刻刻、在起心动念之际都要存天理,在举手投足、视听言动等具体的每一事上都要存天理。《困学录集粹》记载张伯行自少年到老年“发言制行,表里洞达”,遵守其诚信“不欺”的为人宗旨,同时,整齐严肃、主一无适,“自私居以至群萃未尝戏言戏动”。<sup>[2](P5-6)</sup>张伯行一生所为是“敬”身体力行的典范。

张伯行和孙奇逢、汤斌一样,重视《小学》的教育,并在学习、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提出《小学》主要在“敬”。张伯行认为,朱熹的《小学》主要分为内篇与外篇,合计385篇,主要目的是“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如此纲举而目张,是为学之人步入大学学习阶段的必由之路。并且,张伯行认为如果要进入孔学之门,必须以“大学”为“统宗”,否则“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而看朱熹的书,如果不以《小学》为基本的话,则“无以知朱子教人之道”。《小学》记载的“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井井有条,循循乎有序者”,即是孔子教育弟子“以入孝、出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之旨也”。

之所以强调《小学》,是因为人在幼年的时候如果不学习《小学》,就无从收敛其心、养其德性,也就无从奠定大学的根基。因此,朱子的教人之道也即孔子的教人之道。而《小学》的主旨是“敬”字,因此必须把《小学》内外两篇章节、句字都“看得敬字义理,此地分明。体之于身而实践之,方知人之所以为人”,以“敬”的态度做督导,才能明白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然后以其身周旋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中,而“心术、威仪、衣服、饮食”无不各有“当然不易之则”,按照这种方法“修之则吉,悖之则凶,然后有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大学之基本以立”。<sup>[5]</sup>《大学》的三纲八目主要就是让人明白这种道理。张伯行认为,那种以为《小学》主要在“敬”的看法并没有了解朱熹“以立教明伦为体,敬其用耳”的深意。<sup>[3](P79)</sup>张伯行认为,圣人之学是可以学而至的,圣人之功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必须坚持循序渐进,随事体察,随时涵养,存其善而去其恶,朝夕省思,不使一理不融于心。张伯行反对专务科举、增饰文辞、究心势利的作风,主张躬行在先、正己修德,笃守孝悌的忠信之道,以礼义廉耻规范自己。

此外,在对鬼神的看法上,张伯行坚持张载的说法。他在注“二气之良能”时指出张载的解释很精

到,“上下千古未曾有人道得”。张伯行把“神气”解释为一种不专属“气”、比阴阳二气精微的存在,惟其如此才能称为“二气之良能”。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庸》中“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夫闻”是从理上讲“鬼神”;“体物而不可遗”则是“落在气分上”。他还指出程颐对鬼神的解释只是解释清楚了后者,只是在“天地功用上见之”,相比之下张载关于鬼神的界定则是“直究其性情,合理与气而为言也”。对此,陈荣捷认为张伯行的注解“真能达张子理学之精义,然彼本人于鬼神之理之诠释,究乏兴趣。故其《续近思录》采集朱子之言,竟不依朱子《近思录·道体篇》采入‘鬼神’条”。<sup>[3](P448)</sup>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由人及己、由个人的德性修养到社会伦理实践的完成和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充满着由责任感、义务感和神圣感的人生目标而构成的动力,奠定了后世儒者的人生基调。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sup>[6]</sup>,到顾炎武之“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无不是孔子所奠定的志存天下、积极用世思想的写照,宋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箴言,更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注

脚。而张伯行清正廉洁,仁德爱民,推崇程朱理学,重视《小学》、主敬的思想,反对祭祀淫祠、肃正风俗,更是用自己的行为来践履这种精神。正因为怀有这样矢志于儒家圣贤之道的理想信念,张伯行才能在土风日下、人心日奢的环境中超然其上,实践儒家修己治人、清廉自守的人生理想。而儒家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经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而流传久远、传承不坠。经张伯行塑造的清正廉洁、忠事爱民的人格精神,不仅在当时受人称誉,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仍受人景仰。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伯行. 禁止馈送檄[C]//郎潜纪闻二笔(卷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4:336-337.
- [2] 张伯行. 困学录集粹[C]//正谊堂全书(第157册). 福州:福州正谊书局左氏增刊本,清同治年间:20.
- [3] 韦政通. 中国哲学辞典大全[K].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
- [4] 潘志锋. 王船山道统论与张伯行道统论之简要比较[J]. 高校理论战线,2003(9):64.
- [5] 张伯行. 小学集解·序文[C]//正谊堂全书(第160册). 福州:福州正谊书局左氏增刊本,清同治年间:5.
- [6] 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4.